

封面 1

普通教育

第一章 普通教育的意義及其源始

普通教育，是指一般的陶冶而言。在英，稱謂 General Education；在德，稱謂 Allgemeine Bildung；在日本，簡直稱謂『一般陶冶』。這種教育是與專門教育或職業教育相對立，其目的是在於發展人類身心兩方面的天賦，以爲各種職業的一般基礎。夸美紐斯（Comenius）說：『教育是全人的發展』；洛克（Locke）說：『教育爲謀身心發達的健全』；盧梭（Rousseau）說：『學爲人類之方』；裴斯泰洛齊（Pestalozzi）說：『教育的意思，是使所有的能力，爲自然的進步和有系統的發展』；福祿培爾（Froebel）說：『教育的目的，在乎真實的純潔的和神聖的生命的實現』；海爾巴脫（Herbart）說：『教育的目的，在乎產生平衡的多方的興趣』。這些都是指着普通教育或

一般陶冶而言的。要之，我們對於兒童設施一種教育，若其目的在於引起他們多方的興趣，發展他們身心的能力，以期他們具有完全優美的人格，就是叫做『普通教育』。其旨趣，是與專門的或職業的陶冶不同。蓋前者着重於普通的訓練，而其價值在於一般文化的陶冶；至於後者，則着重於特殊的訓練，而其價值在於實際生產能力的培養。可是這兩種教育的性質雖不同，但彼此仍有相當的關係。受了普通教育，若不繼之以專門的或職業的訓練，則個人必不免流為空虛淺薄，而毫無所能，或毫無所用；反之，若僅受專門的或職業的訓練，而毫無普通文化或品格的薰陶，則個人必將流為狹義偏頗，而缺乏共同的理想和一般行為的標準。故兩者應該互相調劑融冶，普通訓練當為特殊訓練的基礎。

在原始的時代，教育極其單純；其唯一的目的，僅求切合於直接的需要。因為當時的生活極其簡陋，故兒童的學習，只是隨同父母，出外漁獵，以供衣食；或在家工作，以禦敵人。除此以外，就無其他複雜學習之可言。在這個時候，根本無所謂一般的陶冶；其實亦毋需這種陶冶。等到後來，社會的生活日形複雜，文化的程度亦逐漸提高。如是，人類自然而然的覺得有受正式教育的必要。正式教育，

是一種有系統有組織的教育。年長的人將文化積累的成績，傳達到年幼的人，使那些成績能夠繼續存在，不至於喪失與遺忘。自從這種正式教育開端以後，教育遂改變其意義。原始時代的教育，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工具，去滿足急切的需要；至於正式教育，則是一種設施，藉以延續與發揚社會的文化。因此，急切需要的滿足，反成為教育的附屬條件了。以後，變本加厲，教育竟與實際生活的需要相脫離，而成為一種特殊階級的權利；所謂一般的陶冶，不過極少數的富有和優秀的分子所得享受而已！這個特殊階級，就是當時治人的階級。他們為要維持他們的地位起見，自應備具相當的知識與才能。為了這種知識與才能的準備，故有普通正式教育的設施。他們既享有各種特殊的權利，衣食無虞，生活安閒；專門技藝的訓練，不特非為必要，且直視為鄙野的作業。總之，當時所謂普通教育，實可稱謂士大夫的教育。他們所從事的學問，大都為知識的訓練，品格的陶冶，和文學或藝術的欣賞而已；絕非為準備專門或職業的訓練的。上節所謂普通教育的目的，是在於發展身心兩方面的天賦，以為各種職業的一般基礎，乃是近代教育的新傾向，而非昔時普通教育的事實。

普通教育，亦可稱謂『文雅教育』或『自由教育』(Liberal Education)；其最初的起源，

遠在希臘。在希臘，教育最盛的，當推雅典。就社會的組織而言，雅典爲純粹的民主國，由市民中互選施政者以行政。但在市民之下，尙有平民和奴隸；故嚴格的說，雅典仍不脫離一種貴族的政治。因此，其所設施的教育，亦僅限於市民之間。主要的科目爲音樂和體操；另外教些算術、幾何、及天文等。至於實用的科目，卻不是市民所必修的學問。其實，當時的學校也沒有這種科目。便是他們所必修的音樂和體操，也並不是盼望這種學問的發達；實不過把牠們來做修養品性的工具罷了。『受教育的人所最盼望的，是內心的堅實、思想的豁達和思慮的周密。所以一般都抱着教育即修養的觀念。以教育爲生活手段，那是平民的事，並非公民的事。』由此可知當時的普通教育，純粹是根據於陶冶主義，而與實際生產技能的訓練無緣的。

在中國，古代教育的理想，亦大抵如此。其代表的人物，當然就是孔子。孔子生在周室衰微的時候；當時各地的諸侯，擅自爲政，儼然成爲許多獨立的國家。其間有士大夫與平民兩大階級的區別，情形適與雅典相類似。最可異者，孔子所主張的教育，亦幾乎與雅典的教育如出一轍。孔子說：『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汎愛衆而親仁；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』可見他是極端重視行爲的陶冶。在論語上，

載有『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』一段。這四項除『文』外，亦都是品性上的事情，而與生活教育不發生關係的。當孔子說：『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』，雖亦注意到『藝』的教育；但這『藝』是包括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者，完全視為修養的工具，並非實用的科目。禮是社交，樂是音樂，書是識字，數是數學，射御乃是體操。這些科目，實與雅典市民所習的差不多。其非為實用的學科，我們看孔子所說，『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！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！』兩句話，就可知道了。

孔子對於職業的訓練，不承認是屬於教育的範圍以內。當樊遲請學稼，孔子答他說：『吾不如老農。』當他請學圃，孔子又答說：『吾不如老圃。』可見孔子的意思，以為職業應該從有職業的人那裏去學，用不着學校來代教育的。這種見解，亦完全與雅典教育的理想一致。孔子不時忽視職業的教育，而且對於生活上的實利，抱有極端的反對主義。所以他說：『君子謀道不謀食，耕也，耨也，在其中矣；學也，祿在其中矣；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』又說：『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。』又說：『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』又說：『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；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』其他，讀其對於顏淵、子路、或子貢等言論，幾乎無處不表示他是完全着重於品性的修養，

而不注意實際生活技能的訓練的。

在昔時，孔子被崇推爲中國的萬世師表；其影響於中國的學術與文化之大，無人能比其什一。故中國數千年的教育，幾乎純粹以其學說爲一切設施的中心思想。重陶冶，輕實學。這種教育宗旨，直至最近實行新學後，而始逐漸改變。孔子學說的影響，有其益，亦有其害。其爲益處，在於文化的延續及禮教的統一。數千年來的古國，仍能繼續存在這風雲多變的世界上，未始不是孔教入人之深，一般陶冶發見巨大效力的緣故。至於其爲害處，則在於孔教薰陶的方式和標準過於呆板與一律，養成一般受教育者固守成規，不謀進取；徒尙虛文，不求實際。結果，以致科學落後，生活簡陋；數十年前的社會程序，幾與數十世紀以前的毫無少異！因此，無怪一與西洋各國相接觸，比較各種事業，都不如人；無形中與有形中，整個國家遂呈現一種崩潰不安的形態。這莫非是受了從前那種消極的個私的陶冶的餘毒。再者，孔教既不切合於實際生活的需要，故一般民衆遂感覺沒有均受這種教育的必要。結果，其能受教育的薰陶者，不過極少數的人而已。至今政體雖已改變，民衆均有受相當教育的必要；但是因爲從前教育政策的偏側，大多數人仍是文盲，不知教育的價值。要求一般教育

的普及，目前尚有許多事實上的困難呢！

昔時歐西的情形，頗與我國實行新學以前的情形相類似。在第十八世紀以先，歐西所謂一般的陶冶者，全爲中流以上的子女所專享，下級人民幾乎毫無領受這種教育的可能。惟至法美革命以後，政權始逐漸改操於平民之手；於是教育遂爲一般社會所注重。爲成人而設者，有成人教育；爲兒童而設者，則有義務教育。大都是着重於普通的訓練。同時，裴斯泰洛齊等倡言人性本無高下的分別，一切人類的基本能力與自然性的圓滿發展，皆有同樣的必要。教育家同聲附和；於是一般陶冶遂愈爲社會所重視。最近民主主義的思潮，日益發達；一般人民皆認爲處於同等的地位，不復有何階級區別之可言。因此，其在上所享受的權利，亦皆互相均等。古時社會中所有治人者用心不用體，被治於人者用體不用心；或勞心者受閒暇的教育，勞力者受勞動的教育等區別，亦均不復有存在的餘地了。其實，所謂普通教育或一般陶冶，至現在始名實相符，備具真正的意義。

關於普通教育的施行，尙有一個個性差別的問題，應約略提出討論一下。因爲有人往往根據個性之不同，遂信一般陶冶爲不可能。其實，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見解！人類個性的差別，雖是事實；

但是屬於量的方面，而非屬於質的方面的。普通教育，原是關於一般基本的薰陶，若非白癡，當無不能接受者。再者，惟因人類有個性的差別，故宜加以一般的訓練，使其有相同的理想、觀念、態度和良好的行為等，以謀在社會上互助合作，藉以固定民族的基礎，及增進共同生活的幸福。至於個人特殊的的能力和興趣，自當盡量發展，以求充分的合理利用；但這是屬於專門或職業教育的範圍，而非一般陶冶的問題。我們上面講過，普通教育應為專門或職業教育的基礎。在民本主義的社會裏，無論何人，均宜經過這兩種相對立的教育。一方面盡量發展個性與利用個性；另方面又盡量使個性社會化，使其成為社會上的優美分子。前者是專門與職業訓練的責任；後者則為一般陶冶的任務。我們所注重的普通教育，當然是這樣平民化的陶冶，而決非昔時那種階級式的教育。

上面我們已將普通教育的意義和其源始，詳為解釋；但從歷史上看來，這種教育每因各個時代的社會背景不同或前後學者的教育見解有別，而異其旨趣的。為要明瞭這種變遷的情形，則我們不得不再有一度歷史的檢討和各個學者之教育學說的搜求。現在為敘述便利計，特在下面另設兩章：第二章敘述普通教育之歷史的根據和變遷；第三章敘述歐、美、及日本學者對於普通教育

的意見。等到明白這兩方面的事實以後，再來討論設施普通教育的機關，及今後對於普通教育所應取的方針和設施。

第二章 普通教育之歷史的根據和變遷

如上章所述，普通教育就是『文雅教育』或『自由教育』的別名，並且含有『一般陶冶』的意義，已經明白了。現在若從歷史上考察，我們可以知道自古代起迄於近世紀止，全部教育史是受着普通教育的勢力所支配的。先述西洋罷，在希臘時代，所謂教育，不外乎是一種普通教育。詳細的說，希臘時代的教育，其目的祇在於陶冶人之所以爲人。然而當時所謂『人之所以爲人』就是說人的心身兩方面必須圓滿發達而成爲文雅優美之人格的意思；所以後人稱希臘的教育爲『審美的教育』。據德國教育史家維爾曼（Otto Willmann）的見解，希臘的教育，就是以求一切方面之精神的啓發爲旨趣之教育。由此可見希臘的教育，其目的祇在於使人成爲一個文雅優美的人，而與世俗上專爲衣食而奔走的人迥乎有別。惟其如此，故後人把希臘的“Liberal Education”譯做『文雅教育』。這雖屬於意譯，但離義不遠，可稱爲恰當的。

如上所述，希臘的教育，既然是以求一切方面之精神的啓發爲旨趣之教育。因此，這種教育，不外乎要造成自由的人格。同時，從社會的觀點上講，希臘人視從事生產職業爲奴隸或半奴隸之事，而所謂自由民全然與實際生活問題相分離；換句話說，希臘的自由民除掉防禦國家外，終日無所事事，對於實際生活問題，不勞而獲，有多數奴隸或半奴隸會供給他們的；因此，他們把所有餘裕的時間都花費在所謂教育之上，對於事物要感到興味而愉快，或養成所謂德操之風。維爾曼又說過：『希臘人視教育爲一種裝飾品，而非實用的必需品；但是所謂裝飾品，並非物質的裝飾品，乃是人格的裝飾；換句話說，即陶冶品性，使人格具有優美的要素，就是教育。這種養成優美的自由民教育，並非出於強制的教授，乃是自由學習；換句話說，即學生自動的去消融精神的內容，以增進自己人格之光。』惟希臘的教育，一方面既然以造成自由的人格爲旨趣，他方面又是專施於自由民，而奴隸或半奴隸不能染指，故後人把希臘的“Liberal Education”，直譯做『自由教育』，亦可謂名實相副的。

現在我們姑不論希臘的教育稱做『文雅教育』也好，或稱做『自由教育』也好，實在講起

來，牠就是我們所謂『普通教育』。怎麼樣說呢？因為維爾曼指出希臘教育的特質之一是多方的學習。但是維氏所謂『多方的學習』並非是今日所謂有豐富性的課程而包容有多種多樣的科目，可以隨兒童個性的差異，任他們自由去選擇而發展其天才的意思；乃是不偏於一方，而以人格之多方的陶冶，調和的發達為教育之要旨的意思。由此可見希臘的教育，是為普遍的精神修養，換句話說，是為一般陶冶所施的教育，並非為特殊職業所施的教育。實在講起來，希臘的教育，就是今日所謂『實業教育』(Technical Education)之對立的教育，或所謂『專門教育』(Professional Education)所施行以前的基礎教育。這層在上章亦已約略說及了。

但是要注意的，在希臘的時代，祇有一種文雅教育或自由教育，然在文雅教育或自由教育之外，沒有另一種所謂『實業教育』及『專門學校』的設施。（這僅是指教育的觀念形態——教育制度——而言的；至於教育的本質，是另一問題。因為關於教育的本質問題，是教育哲學的範圍以內之事，非本書所能涉及。）照這樣說起來，希臘的“Liberal Education”一語，如果把牠與所謂“General Education”相提並論，那麼，又祇可以把後者譯作『一般陶冶』。否則，如果我

們把後者譯做『普通教育』，視牠爲專門教育所施行以前的基礎教育，似乎未免太早計的。

照上面幾段話看起來，希臘的教育既然是多方的，換句話說，不偏於一方面的，而以人格之多方的陶冶，調和的發達爲教育的要旨，所以希臘初期（即古典時代）教育的課程，不外乎體操與音樂兩種而已。體操爲養成作戰適用的體格，有種種之武藝；後者爲神前適用的舞蹈、歌唱。這種課程，不外乎如上面所說謀心身兩方面之圓滿的，調和的發達而成爲文雅優美（精神美與身體美）之人格的主要工具。但是這是指希臘初期的教育而言的；至於希臘後期的教育呢，牠雖則仍爲文雅教育或自由教育，然其內容大形變更了。具體的說，自雅典戰勝波斯，代斯巴達握有希臘的霸權以後，希臘的教育爲之一變。在這時代內，從前之體操與音樂逐漸廢弛，轉而偏重於文法、修辭、數學（幾何學與天文學）、哲學及其實際的應用。惟其如此，故後人有指這時代的希臘教育，是爲百科的知識，或主知主義的教育，也爲對國家主義的自由教育。

再引伸的說，希臘初期的人民，尤其雅典的人民，雖則愛自由而好活動。然而他們祇知有團體的自由，而沒有個人的自由。因此，當時希臘的教育是注重於情意的陶冶，而以體操與音樂爲主要

科目。但是希臘後期的人民，不消說素愛自由與活動的雅典人，就是專講服從與紀律的斯巴達人，至此也一變從前的態度，而傾於個人主義的自由了。因此，這時希臘的教育是偏重於知識的陶冶，在體操與音樂之外更添加許多關於知識的科目。這種教育運動，最初是以『詭辯學派』(Sophist)爲其中心，世人稱之爲『哲人運動』。這一派學者，有人(例如杜威罷)稱之爲『旅行的教師』。因爲他們在歐洲最先以教人爲專業的教育家，把德性、政治、方術、與城市及家事的管理法，教授青年。同時，他們有種種哲學上的見解之發生，各主一詞，反覆辯難；究其實，他們以爲真理沒有客觀的標準，可以隨人的見解而異的，一句話，人爲萬物之尺度。因此，他們弄得思想界非常紛亂，使一般國民多傾向於個人主義了。惟其如此，故昔日之國家主義的自由教育，至此一變爲個人主義的自由教育了。

在這時候，有蘇格拉底(Socrates)其人睹此現狀，慨然憂之，於是另闢思想方法的途徑，唱所謂『知識同歸論』，以爲道德上的紛亂原因，是在於知識不足。道德之所以紛亂，由於知識無標準。他所以想找出一種標準來，使得是非真僞，都統一。同時，他在國家主義之下，欲挽救當時個人主義

的弊風，於是他又唱道德爲社會生活幸福的基礎，深信服從爲雅典市民的義務。他以爲我們欲實行道德，不可不先求知識；質言之，有知識者，必有道德，教育的任務，就在於此。蘇氏所主張的這種國家主義的自由教育，固然是要補救當時的那種個人主義的自由教育之缺陷，然其內容已非昔日之體操與音樂教育，專注重於情意的陶冶，乃是以哲學爲主體而偏重於知識的陶冶了。

蘇氏的弟子柏拉圖 (Plato) 又發揮其師的教育思想，著有共和國 (Republic) 1 書。此書專論他所謂理想的國家，以示其教育的方針。他如同蘇氏一樣，對於個人主義而唱國家主義。依他的主張，非先有理想的國家，不能有正當的教育，等到這種理想的國家已有之後，所謂教育，不過專門用來保存這種國家。然而要使這種國家成立，他不得不期望有些可喜的偶然機會，使哲學者得到一國的統治權。然則這種哲學者將怎樣產生呢？依柏氏的意思，這種哲學者又非特有一種特別教育不可。柏氏主張人類依天性就已分幾個階級，並且本此主張把人類分做三類：第一類，只有極少數人，具有『理性』與真實的思考力，能從理性的觀察點以了解事物，此類人就是『哲學者』，應當爲全體社會的統治者。第二類，有些人於嗜慾以外，尚有寬宏的、坦率的、勇敢的天性，就歸入軍

人階級，爲對外防禦與國內治安的保障者。第三類，是大多數人民，他們的天性只有嗜慾，一生只注意個人的慾望；此類人就歸入勞動的或商賈的階級。他以爲第一第二兩級，必受教育。第三級，唯使粗知通商之道而已。軍人的教育，以體操音樂爲主；而執政者的教育，即於軍人教育之上，更授以幾何、天文、及修辭諸科，使之加功深造，銳意鑽研，如此習十年之久，以作治哲學的預備。後再專治哲學五年，至三十歲，始出世去練習國家事務。至五十歲，始使爲執政者。他說：『非哲學者不能治國，必哲人在位，國家始得存立。』他對女子主張與男子受同一的教育，並且以爲如將來爲執政者之妻，則亦必學哲學。柏氏的這種人性的分類，是否合理？姑置勿論；現在我們單從他的教育主張看起來，就可知他所謂『理想國』的教育，是富有貴族主義的色彩之自由教育；若再從他主張『非哲學者不能治國』這一點看起來，他的教育思想，仍不外乎主知主義的教育精神之表現，並且可視爲軍事宗教萬能之反響。

繼柏拉圖之後者，爲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。亞氏主張教育的目的是在完成道德的生活，使人成爲善良的國民。在表面上看來，他似乎與蘇氏不同；即蘇氏是以知識爲出發點，而亞氏則以意志